

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 9.8%,其中“十一五”期间高达 11.2%,取得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成就。但进入“十二五”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未能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 年为 9.2%,2012 年和 2013 年皆为 7.7%。按照国际标准,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仍是鹤立鸡群,但在国内外分析家中产生了经济悲观情绪。一些国际上的观察家关于中国经济将要“撞墙”,乃至泡沫即将破裂的预言不绝如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尽管得以改善,但仍成为唱衰中国经济的素材。国内一些分析人士也受到增长速度减缓等现象的影响,陷入经济悲观论。

这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以往“狼来了”谎言的重复,还是会不幸而言中?关于增长速度的悲观情绪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通过科学分析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对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更影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而影响政策手段选择的恰当与否。

一、中国经济正常进入换挡期

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有学者在分析多国历史数据后发现,以一个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拐点,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平均 6.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 3.3%。分别看不同的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减速本身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在换挡期采取的应对之策,却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度但可维持的增长,还是一路减速至长期经济停滞。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经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亦称增长速度换挡期。在过去 36 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条件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为,第一,较低且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力充分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份额;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意味着资源实现了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在 1982—2010 年期

间的 GDP 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 7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 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 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 9.6%。

多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 2010 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而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根本性变化,首先表现为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过程。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决定 GDP 的潜在增长率。而从需求方面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决定了该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其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增长。由于人口因素的影响涉及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 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GDP 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 1995—2010 年这 15 年的平均 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 7.6%,到“十三五”时期还将下降。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过去两年中国实现了 7.7%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方面因素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方面的短期冲击结果。第二,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 7%—7.5%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压力。第三,人口因素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我们说建立在“崩溃论”基础上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认识是有害无益的,是因为这样的错误认识会妨碍我们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大多数悲观论都把中国经济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以往的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不仅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负责,还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一般建议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国内需求对 GDP 的贡献份额。与此逻辑上相连的政策建议是,既然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那么,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则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由于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就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从而供给因素制约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过补贴等方式保护落后产能,并不会对竞争性的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

二、正确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

我们说建立在“崩溃论”基础上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认识是有害无益的,是因为这样的错误认识会妨碍我们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大多数悲观论都把中国经济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以往的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不仅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负责,还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一般建议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国内需求对 GDP 的贡献份额。与此逻辑上相连的政策建议是,既然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那么,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则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由于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就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从而供给因素制约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过补贴等方式保护落后产能,并不会对竞争性的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

由于基础设施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实体经济没有更大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产能过剩之外,只会把流动性引向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最终推动经济泡沫。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破裂以及此后的长期经济停滞就是一个例证。

因此,针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政策应对,第一步是使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2012 年和 2013 年中国实现了 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失业问题。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 4.1%的水平,而调查失业率大体保持在不高于 5%的水平。根据测算,由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率目前大约为 4.1%,不高于 5%的调查失业率则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而结构性失业不能靠总量刺激政策来解决。

可见,近年来政府确定的 7.5% 的 GDP 增长目标,由于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宏观经济受到需求方面因素冲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选择恰当政策手段时,区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的冲击因素至关重要。

三、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以往的增长源泉已式微,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

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也比较成熟,实现每一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它们不可能有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中国经济也会到达这个阶段。但在这之前,通过消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碍,在一定时期里仍可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虽然不应寻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

但是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就是获得改革红利的过程。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压力,与过往 10% 的增长率相比显然是降低了。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依靠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不必通过抑制增长速度,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

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例如,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在 2011—2020 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 0.88 个百分点,如果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 0.99 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 1.8 的水平,则可以在 2030 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 10%—15%。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约束条件看,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一些具有优先地位、需要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 35%,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并同时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制订负面清单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鼓励更多非公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同样能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将增进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这些改革,无疑都在创造制度红利,显著约束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

■盛洪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年前的争论

前些日子有记者打电话给我,想就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演讲”做采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演讲当年是在天则所发表的,并且有当时演讲及讨论的完整记录。我这才知道杨小凯至少是在天则所第一次发表这个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我一般觉得,像小凯这样的学术名人到北京来,应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发表演讲。现在看来他只把这个演讲放在天则所,真是对天则的偏爱。

说实在的,我尽管认为他的演讲闻所未闻,也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或可能会引起争论。现在看当时的记录,评论的人多是有肯定,有批评。比较意外的是,周其仁也到场了。他以一贯的风格,坐在较远的一个角落,并不引人注目,只是发言时大家才知道他也来了。这似乎也证明,小凯并没有在北大约定一次“后发劣势”的演讲。

我后来也并不知道,林毅夫就这次演讲专门写文章与小凯辩论。这大概要怪我对他们的杂志《经济学季刊》不太关注。记得最初一些时候,他们曾期期寄我,但后来大概看我没什么贡献,就从寄赠名单中除名了。不过这次在上海的纪念小凯逝世十周年的会上,小凯的这篇演讲又成为辩论的导火索,林毅夫与张维迎就此争论起来。只是媒体很喜欢学者之间的争论,于是就成了“林张大战”。我记得科斯教授曾说,民众喜欢消费“争论”,这也是思想市场存在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也不能怪媒体渲染。争论起来让大家看热闹,也是学者的职能之一。

虽然传媒已经转向,问题还在那里。既然十年前的争论今年还在延续,文字晚了几天,也就不算晚了。

杨小凯的理论

关于后发劣势的说法,似乎有很多误读。这主要是因为一个观点往往会被简化或意识形态化。简化的好处是容易记忆和理解,但代价就是偏离原意。简化的“后发劣势”似乎是

这样的:后进国家只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并因有所成就而认为自己的制度也是好的,从而放松了对制度的改革,反而会因为制度落后而永远落后。

用这种“后发劣势”理论来套中国,就可以说,当时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由于学习总比自己开发要快,所以中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或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这一成就就会使中国人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也很好,甚至比其他领先国家还要好,无需改革,从而反而会使中国落入低效制度的陷阱中,从长期看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在今天看来,小凯的这种预言式的理论似乎在被证实。我们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奇迹,一些人在宣称出现了一个“中国模式”,一个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这一模式中,不是有效的市场制度,而是中国不同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样板)的地方,如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崛起,才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中国在政治结构上就不仅无需向西方领先国家学习,甚至还比它们优越。尤其在 2008 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内的一些人的这种看法达到了顶峰。如强调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一掷四万亿地刺激经济,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以致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

然而,由于演讲毕竟是不够充分和严谨的,时间也受限制,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似乎有不少破绽。一是他断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成绩主要依赖于引进技术,而在制度上没有什么改变,是有着重大疏漏的。实际上,自 1978 年以来的改革,更根本的是制度变革,甚至是宪政改革。一般以为,宪政改革似乎需要某种高调的宣言,和成文宪法的制定或重大修改。其实不然。所谓“宪政”,就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能写入宪法,也可能并没有写入宪法,甚至某些号称宪政国家的社会就没有成文宪法。如英国。科斯教授曾不无讥讽地说,美国有那么多人研究宪法,是因为美国有一部宪法。因而,所谓“宪政”,往往作为一个社会的无形规则存在着。

而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实际上发

生了 180 度的转弯。如果没有根本规则的改变,这一转弯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个重要宪政原则的改变是,将政神分开。其经典表述就是陈云所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是神,就不会犯错误,所以,就不会接受批评和改正错误,才造成了他在 1949 年以后不断犯错误,又坚持错误,继而犯更大的错误,直到文化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

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申明,“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就是禁止把政治领袖看作神。“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等当时的领导人承认自己并没有全盘把握和明察秋毫,而是根据改革或政策的结果进行调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另一个派生的结果,就是结束了政治领导人的终身制。第二个宪政原则的改变是,不把某一理论或主义当作事物或工作对错的标准,而是把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作为标准。其经典表述就是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价值评价的根本改变。只要回到毛时代和改革初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价值标准在那时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所重现的那样,那时没有政治审查的高考,促进知识交流的外国书籍的引进和译介,避免挨饿的“包产到户”,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外商投资,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土地出租,都被以不符合某种主义的名义遭到禁止或反对。

第三,由以上原则派生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社会把市场制度当成一个基础性制度,甚至是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若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市场是最好的制度。这之所以具有重大宪政含义,是因为它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官方与民间的边界。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就实际上直接掌控了所有人力资源,也就按其意志将资源配置到了所有领域,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物质产品领域和精神产品领域。而政府就是一个权力配置的体系。用权力配置资源,就必然要限制人的自由;且由于政府

控制了几乎所有资源,弱小的个人就没有任何可以逃遁的空间,从而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任何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当市场边界扩展了,也就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边界扩展了。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政府是 100% 减少到约 38%,或市场从 0% 上升为约 62%。这个比例虽然可以从市场和政府影响经济的领域占 GDP 的份额中看出,但更重要的,是在其背后的制度变化,以及制度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在政府主导和控制的计划经济中,民众的经济自由被限制和剥夺了;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能自由地创办企业,甚至不能自由地买自己想买的产品。而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由。而今天,这种自由的观念已经是一个常识。当我们通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回顾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在 70 年代末农民不能养超过四只的鸭子,知识青年必须被迫在云南农场工作,感到恍如隔世,这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甚至就是宪政改革。

反过来,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先进技术也不能很好推广。因为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使用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开放前我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我亲眼看到新技术推广之艰难。只有几个技术员在推广,而工人们没有积极性去使用。在大锅饭的体制下,他们为什么要干得更多?因而,技术创新虽然在某些时候单独发挥过作用,但更根本的是制度变迁。好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因而,只用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奇迹的解释,似乎是不充分的。

但是,以杨小凯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这样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呢?原因似乎在于,他把英美宪政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宪政制度的普遍形式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太不像宪政原则了。这源于他对宪政主义资源的误解。似乎在他看来,只有英美宪政主义才是正宗的宪政主义,而其根源只出自英国和美国。这显然是狭义地理解宪政主义所致。实际上,宪政主义是指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需依赖的

一组基本原则,社会治理的所有具体规则都由此派生出来。所以保证这一组基本原则能被实施,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而有能力和机会违反宪政原则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所以在说到宪政时,一般就是指的限制政府权力。

谈到限制政府权力,这是古今中外政治中的重要难题。人类社会各个文明也都作出过各种努力。除了现代的民主制度,宗教对世俗政权的约束也是西方社会的一种“限政”措施。如广义来看,中国汉代的天人感应说也是一种“限政”努力。而谏议制度、史官制度、太傅制度和监察制度等,都是限制权力的制度创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儒家认为有一种高远深邃、凡人无法企及的天道,政治领导人作为一个凡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天道并始终遵循天道。这就需要有一种制度结构,通过约束、限制或鼓励使政治领导人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治理符合天道。而士大夫集团就在这个制度结构中起着约束和限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如当汉文帝问陈平,宰相不知刑狱和财政数据,那是做什么的?陈平回答说,我们要保证你对天下的治理能够顺应天道,和谱内万物(“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

因而,宪政主义资源不独只存在于英美,还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很丰富。中国人是应该全面吸收全世界的优秀的宪政主义遗产,但也不应独独不对本国资源开放。实际上,中国的宪政主义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因其具有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正如欧洲的宪政主义资源更容易被欧洲人接受一样。如果只以某一国的宪政的外在形式为标准来判断另一国是否出现了宪政改革,显然抹杀了宪政资源的丰富性,而且无法解释为何人类各文明或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交错前进的。在小凯演讲后的讨论中,我曾说,如果在中国领先的唐宋时期说,如果不学习中国就永远落后,似乎是不正确的。因而,当小凯说如果中国不建立像英美那样的宪政制度就会永处劣势地位时,似乎也是不正确的。

(下转 04 版)